



第 8 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李 杨
[副主编]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第 8 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李 杨
[副主编]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市文化评论. 第8卷 / 田根胜, 黄忠顺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360-6488-1

I. ①城… II. ①田… ②黄… III. ①城市文化—中
国—文集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618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欧阳衡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者的话

由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城市文化研究:问题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24日—26日在长安莲花山庄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城市文化研究知名专家与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电视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等,与会专家学者就城市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城市文化的实践、文化传统与自然、“都市生活”等与城市文化相关话题展开深入探讨。会议探讨的问题与观点,不仅对东莞理工学院继续开展城市文化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对当下全国范围内城市文化研究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城市文化评论》第八卷即是本次会议的研究成果。

当下,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已经成为我们置身这个被称为“现代”的世界中最怵目惊心的现象。“城市中国”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存在”,不仅是洞察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窗口,而且,以城市或城市化为话题,可以捕捉到急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那些细微但却至为关键的脉动,以及这些变革中所蕴涵着的深层次矛盾及其文化影响。因此,有关城市的研究与思考,不仅具有理论探讨的价值,而且还有直面当下的实践意义。

城市文化研究是我们时代的大主题。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以制造业为轴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向以文化为轴心的城市发展战略的转型。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朋友,当然会对这种城市转型有深刻的体会和种种精彩的见解,就是我们身处东莞这样一个由传统的农业县城升格为地级的城市,也同样感受强烈。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就是通过制造业的迅猛发展而崛起,闻名中外。其电子信息、电子机械、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玩具制造等产品遍及世界。东莞人曾经为这种情况而骄傲,但这种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说明我们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由加工制造向文化转型的时候。

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文化、文本、文学、传播等层面切入城市研究,为城市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但是,将“城市(城市化)”视为“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如是观,城市治理及其研究的“文化转型”的依据是什么,城市生活的商品化、景观化、符号化等单向度的理论背后新的主体如何建构,等等,都是摆在我们城市文化研究工作者面前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目前,城市文化研究已成显学,众多研究从文学、电影、文化、民俗、传播等众多层面讨论城市文化的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所有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城市文化”这个框架内展开,导致了缺乏对这一框架本身进行思考的能力。在我看来,需要对不证自明的“城市文化”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将“城市”视为一种“文化”进行梳理与辨析。它意味着我们不能也不应

该将“城市”及“城市化”视为一个超文化的历史进程,将“农村”与“城市”的对抗理解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如果将“农村”与“城市”这一空间范畴解读为“传统”与“现代”表征的线性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对“城市”与“城市化”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批判,更无法理解不同历史文化赋予当代人的生活意义。这也是我们举办“城市文化研究:问题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的初衷。

东莞理工学院是一所地方性院校,办学时间不长,知识的积累也十分有限。之所以选择“城市文化研究”作为我们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特色专业发展优势的考量,另一方面也试图直面东莞这一个快速成长的现代都市所浓缩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矛盾与问题。

《城市文化评论》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一家连续出版的评论集已有5年的历史,并能够坚持下来,当然与学校的支持,尤其是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在未来的道路上,仍希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共同培育这一株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的幼苗,我们期待着它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一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这次研讨会就体现了我们的追求。

编者的话	1
理论前沿	
李珣平 瞻望原点:城市文化研究的基点与向度	2
孙民乐 城市文化:危言与卮言	11
王 晖 关于城市文化研究传播的思考 ——以《城市文化评论》为例	19
大都市视野	
董之林 让历史照亮现实 ——探求当代文明的一种生活方式	24
李 杨 在东京(开封)发现历史	27
张 法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和文化大国的象征体系与京城 模式	37
曾 军 上海作为方法 ——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	53
城市叙写	
杨立青 民族志: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关于《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	64
高小康 当代中国叙事中的城市形象	71
柳冬妩 打工文学的城市书写	80
城市转型与文化转换	
袁敦卫 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 ——写在东莞建设文化名城之际	84
许燕转 文化气根:城市文化中的新移民身份建构	91
黄士芳 城市化、城市更新与城市传统 ——以深圳市为案例的文化变迁研究	98

胡 磊	城市转型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108
城市镜像		
姚朝文	岭南武功题材电影的新界碑 ——《叶问 2》对《叶问》的继承与超越	120
严前海	吴苏品 千年的困境:移民题材电影解读	128
袁 园	《海上传奇》:城市书写与帝国魅影	141
城市记忆		
卢 冶	“互文城市”与“反类型”书写 ——2011 年的《租界》传奇	152
冯丽霞	论苏轼杭州生活与词作繁荣之关系	164
王 彬	白塔寺地区的历史地理	172
严纪华	论张爱玲的城市书写:以《第一炉香》为例	181
陈英敏	谈穆时英的洋场文化理性	191
城市形象与传播		
张艳红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传媒应用的问题与原因探析	200
王国利	文化自觉视野下的西宁城市精神构建	213
何国平	城市形象传播:框架与策略	219
文化与产业		
李 晓	神话原型在文化产业中的开发利用	230
李柯霏	王志章 文化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综述	236
李金祥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中的问题及解决的路径	245

理论前沿

LILUNQIANYAN

瞻望原点：城市文化研究的基点与向度

李珺平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城市文化研究中的原点、基点与向度问题。本文认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原点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反复追问，以及研究者对研究基点与研究向度的反复核准。而研究基点，就是研究者的立足点、出发点或视点。至于研究向度，则是研究者从基点延伸开来的方向和程度。在追问研究对象过程中，本文分析了城市与都市及城邦的差异，认为“Urban Culture”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表述。在讨论基点与向度过程中，阐释了在基点构成与向度应用上研究者应注意的细节，并说明了如果研究者缺乏理性可能出现的偏差。

关键词：城市文化，原点，基点，向度

—

一种时刻瞻望原点的意识，对学术研究很重要。它至少有三个好处：首先，它可使研究者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程度距原点到底有多远，推进了多少。其次，它可矫正研究者的学术目标，使之不断省察正在谈论的话题是否有所偏离，进而思考如何才能回到原点或如何才能与之接榫等问题。最后，它可使研究者自我惊醒，以便从原点混沌朦胧的母体状态中生发出某些新课题或开拓出某些新领域，并将现有的研究活动与之接轨。

城市文化研究的原点，在我看来，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反复追问，以及研究者对研究基点与研究向度的反复核准。

二

城市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我认为，它追问的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这里，“城市文化”就是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研究者才可能在同一个对象的设定之下各自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展开研究。换言之，“城市文化研究”的存在，依赖于研究者对“城市文化”的确认。如果没有确认，或者说，如果对“城市文化”限定不一样，就会使研究对象有差异。而研究对象不同，又会导致自说自话。

什么是“城市文化”？

我认为，这涉及“城市”与“文化”两个概念。而对它们的阐释和梳理，就会构成“城市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也会形成“城市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

三

先说“文化”。

文化(Culture)，根据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A. L. Kroeber, 1876—1960)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 1905—1960)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检讨》可知，从1871到1951年，西方学者的定义有164种^①。虽然定义纷繁但毕竟是对同一概念的说明，所以亦有共同点，亦即广义狭义之说。广义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此明显采纳了马克思(1818—1883)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说法。在我看来，广义概念太笼统，而狭义概念差可使用。这是因为，狭义概念所包括的三个层面——社会意识形态、制度与设施——大体可说明城市文化的特征。

具言之，(1)在时间和空间的广延上，城市文化，应该是指人类在设计、规划并建造城市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现象，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也包括制度形态与设施形态的。(2)城市建造的一切设计、规划理念等皆具主体性，也就是说，渗透了社会意识形态。(3)一切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制度形态(行政职能、军事职能、文化职能及通令、条文等)，表面看来，好像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实也是城市主宰者(或拥有者，或管理者)理念的体现，也具主体性和意识形态属性。(4)构成城市基本形状或与基本轮廓有关的所有物质形态(如建筑、设施等)作为一种人造的自然(或“人化自然”)，毫无疑问，还是某种理念的体现，仍具主体性和意识形态性。(5)

因此，与大自然自存自在的高山、长河、莽原、冰川及处女地等不同，城市纯粹是一个“人工制品”。其中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或局部的对自然的借用等，但已完全“人化”(或曰“艺术化”)。人工建造物与自然物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前者蕴含着主体人的思想观念。黑格尔(Hegel, 1770—1831)曾以活的狮子与画中的狮子相比较，说明了差别。他说：“我看到一只活的真狮子，这只狮子的这一次的个别形象使我对狮子形成了一个观念，就像一幅画中的狮子的形象也会产生完全同样的结果。不过画里却还有更多的东西，画还会显出这个形象曾经在人的思想里打过转，它的实际存在起源于人的心灵和创造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从画里所得到的不再是关于一个对象的观念，而是关于一个人的观念的观念。”^②



① 王康：《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②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页。

归纳之,城市是人工制品,在它所呈现的物质形态(建筑、设施等)背后潜藏着统治者(主宰者、拥有者或管理者)的某种理念,而为了使用城市或管理城市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形态(各种职能及措施)背后也潜藏着他们的强力意志。更进一步,甚至城市机制本身的默默运转乃至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模式等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其实也是统治者某种理念或某种意志的体现,或者说,多少被统治者所支配。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城市文化的底蕴。

如果狭义文化的三个层面适用于对城市文化的阐释,就得承认城市文化当中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和决定作用:它既是构成城市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贯穿城市文化的潜隐线索,还是城市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意识形态有不同种类,如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意识形态……就城市文化而言,我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其余是辅弼。由此,研究城市文化必须关注政治意识形态。

四

次说“城市”和“市”。

我认为,单独讲“城市”讲不清楚,只能在对比中完成。与“城市”相关的概念,主要有“都市”、“城邦”等。借助于对三者的分析及比较,也许能实现对它的了解。

要分析比较三者,又必先说明“市”。

这是因为,城市、都市、城邦虽各有特点,但“市”的功能是一致的^①。

何谓“市”?作为动词,简言之,“市”就是交易、贸易、做买卖,就是以物易物或以钱易物的商业活动。英语的“Market”,古汉语的“互市”,都是此意。有了交易、贸易和买卖活动,便有了市场。“市”,作为名词,就指“市场”。英语的“Marketplace”,即市场。《说文》云:“市,买卖所之也。”^②此“买卖所

之”的处所,亦指市场。《易·系辞下》有“日中为市”的“市”,还是市场。从新旧《唐书》唐人笔记及《宋史》、《东京梦华录》等可知,唐代的长安已有极其成熟极其繁华的市场(“东市”、“西市”),而宋代汴梁则有更大更开放的市场。李白(701—762)“长安市上酒家眠”,就描写的是自己在长安东市(或西市)醉酒的状况,北宋张愈(生卒不详)“昨日入城市”,则抒发的是对汴梁市场上“遍身绮罗”者的愤怒以及对“养蚕人”的同情。注意,“长安市”不是地名而是指长安城中的市场,“城市”也不是地名而是指汴梁城中的市场。

由上可见,“市”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活动密切相关。“市”的功能不仅是中西方一切城市、都市、城邦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中西方所有城市、都市、城邦得以建造的主体性方面的根本动因之一。一句话,没有“市”,就不可能有城市、都市或城邦。

五

了解了“市”,更进一步比较就容易了。

1. “城市”不是“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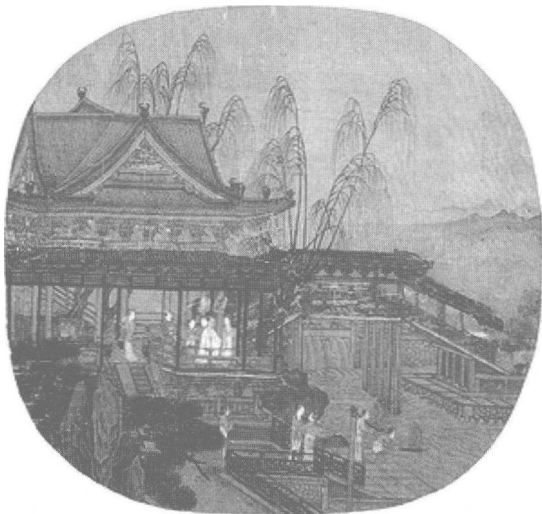
前者是一个大概念,后者是一个小概念。就历史言,一切有封疆(或城垣)有政府建制人口相对集中又具市场和商业交易功能的地盘儿,都可叫城市。就现实言,无封疆(或城垣)但有政府建制人口相对集中又具备市场和商业交易功能的地盘儿,也可叫城市。但“都市”就不一样了。都市,古代叫都。何谓“都”?《说文》云:“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段玉裁(1735—1815)据《左传》解释说:“凡

① 李珣平:《“都市文艺”:定位、性质及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

② [汉]许慎[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①可见,都,是与邑相比较而存在的。邑,小城也,为卿大夫所居之地。都,大城也,特指那个由宗子(国君)掌管并拥有宗庙且供奉着历代先君神位(神主牌位)的城市。一般而言,它是该国的都城。

商代以前(含商),华夏大地林立着各种各样有统属关系或相对独立的小国。它们各有自己的都和邑。西周以后不同了,天下有了“共主”(天子)。这意味着,只有天子所居之地可称为都,其他城市(包括原先各国的都)的地位都得下降,降为都鄙。何谓“都鄙”?《周礼·大司徒》郑玄(127—200)注云:“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②其意为,诸侯所居之地,只能叫都鄙,



中国古代都鄙图

不能叫都。从“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③可知,最早的“都鄙”没有高大城垣与高深护城河而只有低矮的土墙(封)和浅浅的人工水界(沟)。为了区别天子之“都”与诸侯之“都鄙”,前者又被叫做“京”(如沔京、镐京)。京,《说文》云:“绝高丘也。”^④段玉裁注云:“凡高者,必大。”^⑤意思是,京,即绝高绝大之所在。绝,无限也。绝高,即无限高;绝大,即无限大。古汉语里,“大”是“崇高”的代名词^⑥。所以,绝高、绝大,即无限崔巍又无

限崇高。很明显,这里的“高”“大”,绝非纯粹测量学意义上的数字尺度,而包裹着丰富的政治学内涵和美学内涵。就前者言,天子至高无上;就后者言,天子至大无朋。

正因如此,后来周公营建的洛邑只能叫“邑”而不能叫“京”或“都”。其意为,天子只有一个,溥天之下“有先君之旧宗庙”的首都也只是一所,即沔京镐京。而洛邑,无非是方便镇压殷民并收纳四方诸侯贡赋(“道里均等”)的一个军事据点和会计所在罢了。平王东迁之后,洛邑才被叫做东都,或成周。这是因为,随着平王东迁,祭祀周王室先君神位的宗庙也被搬迁而来。尽管如此,洛邑也不能叫“京”而只能叫东都或成周。原因在于,平王东迁虽是被迫的,但名义上却并没有放弃对于天下的统领权^⑦。在东周政府的文告中,平王是暂时住在洛邑而等待着重新收复并回到旧京的天子。由于洛邑靠东,与沔京镐京适成对比,叫东都。又由于洛邑是成王时由

① [汉]许慎[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④ [汉]许慎[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⑤ [汉]许慎[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⑥ 孔丘云“大哉,尧之为君也”(《论语·泰伯》),孟轲云“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下》),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章》),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这里的“大”、“大美”等,皆指“崇高”。详见李璿平:《中西方崇高理论比较研究》,原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今《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美学》1990年第3期转载,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转载。

⑦ 这就如同后来偏安于长江之南的朝代仍称长安洛阳等为京兆或都一样。

周公建造的,与文王武王营建宗周(沔京镐京)相比,又叫成周。

早在分封的同时,诸侯们已开始了在自己都鄙上建造城市的活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分封时间较久各诸侯国势力坐大及相互吞并等,出现了“礼坏乐崩”局面。有些诸侯(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也在自己的城市设立诸侯宗庙,将始封者作为太祖而将历代宗子作为列宗予以祭祀。由于有了宗庙也有了先君神位,这些城市后来也被称为都。以战国七雄为例,秦咸阳、楚鄢郢、齐临淄、燕蓟、韩新郑、魏大梁、赵邯郸等,皆是。但须注意:(1)此时都虽多,但对每一位诸侯来说,却只有一所。(2)东周虽衰但仍是名义上的天子,所以天子之“洛邑”相对于各个诸侯之都来说还是一个绝高绝大之所在,故其有不可逾越的名称——“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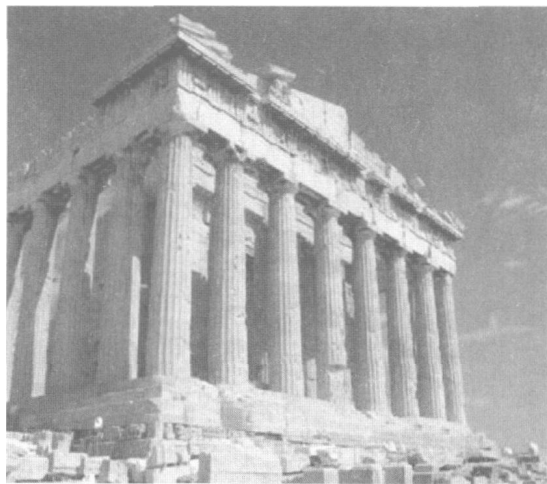
秦汉以后,华夏大地上除“都”外逐渐出现了地方城市(或曰锥形城市)。这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国家也只准有一个皇帝一个宗庙。换言之,只有首都才允许有供奉天子列祖列宗神位的宗庙,地方城市则无。相对于首都而言,地方城市只是大一统中央王朝派出的分理机构的驻扎地。不管秦汉的郡太守还是唐宋的州刺史,一般都只是朝廷的官吏而不具备皇室血统所以没有资格建造宗庙。即使是被分封在某一个地方城市做首领(或诸侯王)的皇帝的儿子或兄弟,由于不是宗子所以也无资格建造宗庙。这样,地方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城”,有“市”,有衙门,有军队,有庠序,有街坊……一切皆有,却还是不能叫都。

必须提及的是,“都市”与“城市”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区别,就是居民和建筑不同。中国古代一直奉行“家国”或“家天下”的宗法制。家就是国,家就是天下。在这种制度下,早期的都,其居民主要是王室之人(天子、宗子及亲属等)、少数政府成员及工商业者(奴隶)。王室之人是核心,政府成员和工商

业者为之服务。春秋和战国初期的诸侯之都,也一样。与国君同姓的士以上阶层住在城内(或附廓而居)叫“国人”或“城人”或“城民”,被征服被统治的其他种姓之人住在城外叫“百姓”或“野人”或“农人”。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筑上的“前市后朝”布局。一般来说,王室居所(王宫与宗庙等)是主要建筑,在最北端。政府是王室的附属物故紧贴之,叫“朝”。为之生产器械杂物及奢侈品的工商业者在南隅,叫“市”。其余皆为同宗人(士以上)所居。从雷海宗(1902—1962)《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可知,春秋之前“家国”军队皆由同宗的贵族男子组成。“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羞耻。”^①在建筑布局上,也有这个特点。早期的都,没有汉唐以后招募而来的所谓的御林军(或禁军)的居所。

六

2. “城市”不是“城邦”。



古代雅典城邦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页。

城邦,是一个外来概念。英文为“City state”,是对希腊文“polis”(城邦)的一种并非完全准确的解释。依“City state”而言,城邦在古希腊是指一个个城市国家(共290多个)。它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并包括周围的村社。但我认为,这只是就地域范围和经济联系所做的说明。从希腊原文“polis”可知,城邦其实更是一个关乎政体或关乎政治的概念。希腊城邦一般实行奴隶主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但至少在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以后,以雅典(Athens)为首的大多数城邦转向了民主制。在民主政治中,国王的权力下降而议会及执政的权力上升^①。后者之权力来自何处,就是公民。由此,公民的地位愈来愈高。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政治学》可知,公民(希腊文polites)是一个与城邦密切相关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那些“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②;而城邦,则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形成的某个整体”^③。由此可知,公民有三大特点:(1)绝对享有审判权和议事权,(2)由于享有权力(含权利)进而也具有某种责任和义务,(3)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一个集体中只有责任和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利的分子)。城邦也有一大根本特点,即,它不仅是一座城市与其郊区在地域上和经济上的结合,更是一定数量的公民的结合。换言之,与其说城邦是一个地域或经济的结合体,不如说是一个政体。

由上可见,不管中国秦汉前建造的都市还是以后出现的地方城市,都无法与城邦比拟,更无法与之等同。因为,都市所潜藏的主体性动机(或理念),主要是供奉宗庙、供养并保护统治者(天子或诸侯国王)及自家人,使之生活安逸并便于从上而发布政令;而地方城市所潜藏的主体性动机(或理念),主要是供奉官府(衙门),并作为皇室的代理机构行使对于百姓的统治权。一句话,中国古代

所有都市或地方城市,处处显现着统治者的强力意志,而老百姓的权力几乎空白。

3. “城市”也不是“城”。

城,古汉语有两义:一为动词,一为名词。作为动词,城,即修建。古文中“城于某”,意思就是“在某地建城”。这是“城”的基本义或原始义。作为名词,城,指城墙。与之相联系的,有城池、城郭、城垛、城门、城关、城防、城楼、城郊等。由此可见,无论建城也好,城墙也好,“城”主要是指一种人工建造活动,或一个人工建造物在地理学上的符号。与之相比,“城市”虽然也包含“城”的因素,但更多凸显的却是“市”以及其他的诸多功能。

七

“城市”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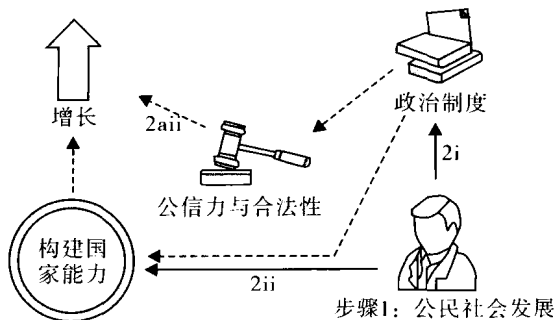
虽然城市不能与都市、城邦、城相等,但作为一个概念,我认为,它的内涵和外延总不能凭空生造,而应该存在于对三者的清理与整合之上。首先,城市具有“城”的因素。这不仅因为古往今来的大部分城市曾经有过城墙(含护城河),也不仅因为现在有些城市仍然保留着它或遗留着它的痕迹,而且因为,任何城市在地域上大抵总有一个粗线条的地盘儿。这个地盘儿的边界上可能没有醒目的城墙,也可能没有环绕的护城河,但总有一个大致的界限,大致的轮廓。其次,城市具有“城邦”的因素。这是因为,任何城市都不仅指城圈内那一个逼仄部分,在地域上和经济上,它总与郊区特别是近郊密切相连的,或者说,后

① 苏格拉底以后,希腊城邦的国王不再拥有像荷马史诗中那些国王那样颐指气使的权力。

② [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选集》(颜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③ [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选集》(颜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者永远都是它的有机部分。换言之,当我们说到某一个城市时,总是包含着它的郊区尤其近郊。尽管中国城市居民目前在行使公民权利时尚有缺憾但并不是说将永远缺憾下去,早在几年前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创建公民社会”的目标。最后,城市也具有“都市”的因素。这不仅因为,一个城市可以没有宗庙没有朝廷,也可以没有皇室(或朝廷)分理机构(或派出机构),但总得有市政府或市政厅,总得有与之相关的行政、司法等管理机构和运转机制,而且还因为,一个城市政府或市政厅的这些机构与机制总会在某一个地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并发挥辐射作用。



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发展

如果上述清理与整合有效,“城市”概念也许可做如下粗浅界定。从外延说,它与大自然与广大农村不同,是一个区域性的人工建造物。从内涵说,它是一个以“市”(交易贸易或买卖)功能为主,被建造者主体理念和意志所渗透,有一定居民居住也有常设管理机构,并由中心区和郊区组合而成,且对某地域经济政治文化起领导或辐射作用的建制体。

如果此内涵和外延可以被承认,那么,“城市”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地名),而且还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既是一个物质体,又是一个精神体,还是一个建制体。由此,它非但不能被“都市”、“城邦”和“城”所涵盖,显然也不能被现代英语中的“City”所

涵盖。怎么办呢?我认为,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评论》刊名翻译很巧妙,是一种颇具智慧的做法,值得借鉴。它用“Urban”(“城市的”)作定语并在后面安置一个中心词“Culture”,来翻译“城市文化”。在我看来,它有如下好处:(1)“城市的”明显比“城市”包容量大,举凡一切与城市有关的研究(如都市研究、城邦研究、城研究、City研究等)均可囊括。(2)它避免了在都市、城邦、城、City之间做艰难取舍,也化解了使用这些概念时可能产生的麻烦。(3)它既具有相对明确的含义,又具备超乎几个概念之上的一种含义。如果说“城市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城市的文化”,那么,“城市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城市的文化”。顺便说一句,虽然“城市的文化”可在去掉助词后简称为“城市文化”,但在研究者的观念中,我认为,却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此“城市(的)”不是彼“城市”,或曰,此“Urban Culture”不是彼“City Culture”。

八

从事“城市文化研究”,有一个基点和向度问题。基点,在我看来,就是立足点、出发点,或曰视点。向度,就是从基点延伸开来的方向和程度。没有基点,研究者不知道自己站在何处,也无由出发。没有向度,研究者不知道往哪里走,更不知道走到什么程度为止。

“城市文化研究”的基点是什么?

我认为,它由两个分点组成:一个是空间点,一个是视点。前者为主体提供客观的立足地(坐标),后者为主体提供观察的标准和方法论。具言之,空间点是指立足于在现实中存在(或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的城市(及文化)。而视点则是主体的理性,以及对奠基与理性之上而形成的不同的理论、方法论和方法的选择与使用。我认为,(1)只有从现实的城市(及文化)或历史上存在过的城市

(及文化)出发,研究者才可能有具体、真实的对象,也才不会凌空蹈虚对一种类似于“皇帝的新衣”那样的东西大发议论。(2)只有具备理性,研究者才可能不被各种障眼法所迷。理性,在我看来,不是空洞的不能言说的,就其现实性而言,是指以常识和公理为基础来观察对象的一种思维能力。所谓常识,即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渗透着真理性的判断。例如,水是向下流的,火苗是向上升腾的,人总是会犯错误也会死的,等等。所谓公理,则是来自于推断但却是事实的某些基本准则。例如,如果甲等于乙,而乙等于丙,那么甲等于丙,等等。研究者若能遵循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和公理,就算是有了理性。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中国人或某些中国知识人来说,尤难。因为,他们普遍具有家国情结,也喜欢顺从权威或主流意识形态说话。就家国情结而言,只要是自己家乡(或自己就业处但产生了感情)的城市或人物就不允许批评,一旦有人这样做,就不分青红皂白说别人是“妖魔化”;只要是自己国家的城市或人物,也一样。在他们眼中,假若自己家乡自己国家(或人物)与别人家乡别人国家(或人物)发生争执,不管事实如何,永远是前者对后者错。就顺从权威或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更是某些中国知识人的长项。从古以来,传统文化(尤其儒家)熏陶了千百万这样的人。今天的幼儿园中小学乃至大学、媒体及各种宣传机构每时每刻也都在培养这样的人。在他们心目中,顺从权威或主流意识形态及宣传媒体的说法总是对的,而一个人独立的研究分析(哪怕是依据事实的)若不符合这种说法就是错的,就是“妖魔化”。他们不明白,权威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睡也会犯错误当然也会死,而主流意识形态也不过是诸种看法中的“一种”也会错。(3)只有依据一定的方法论(或产生这种方法论的理论)及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才可能有价值,才不会空口说白话。在现实中,有些研究者很努力也很想做出一些创造

性成果却无法达成,原因就在于自己的研究缺乏基本的方法论,纯粹是凭一鳞半爪的感受或感想来立论。

九

“城市文化研究”的向度是什么?

从如上基点出发,“城市文化研究”的向度可能会有很多。笔者不准备全面涉及,只想提出两个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予以讨论,即:历史向度,和未来向度。它们在观察研究现实中的或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城市(及文化)时,都须采用。

所谓历史向度,在我看来,就是用历史眼光打量并评价对象。在打量和评价中,我认为,应该有基准点和参照系。这里的基准点,我认为,应该就是还原与理解。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具体城市(及文化),都有自己或久远或短暂的历史。要研究它,首先应小心翼翼予以还原,然后才能从历史角度予以理解,予以评价。如果不能够相对客观地还原与理解,也就无法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这里的参照系,我认为,就是在未来眼光照射下所确认的一些具有现代性的原则。例如,以人为本原则、公民社会原则、与自然和谐原则等等。参照系相当重要。没有它,还原理解与评价就不可能有现代眼光,更不可能有未来眼光。也就是说,研究者将可能永远停留在“鬼打墙”一般的“同情”中,而无法发现问题与不足。其他原则就不说了,但“以人为本”原则必须予以说明。因为,“以人为本”不是“以民为本”(“民本”)。后者是一个儒家观念而前者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观念。区别在于,(1)从词性言,“民”是一个集合名词而“人”指一个个独立的人。(2)从内涵言,“民”是空泛的而“人”是具体的有个人权利(权力)因而也有责任和义务的人。(3)从功能言,“民”在儒家话语体系中是工具(是一种用来载舟[统治者]的水[工具]),是像羊

群蜂群一样被主人养来为己服务的群氓,而“人”在现代性语境中自己就是本体,就是目的^①。这就是中共“十七大”为什么不用“民本”而采纳新词“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因。

所谓未来向度,在我看来,就是用未来眼光来观察并设计对象。在观察和设计中,也应该有基准点和参照系。这个基准点,我认为,就是期待与渴望。这是因为,当研究者从未来向度打量某一个城市(及文化)时,多少总得有一点儿前瞻意识。这种前瞻意识,其体现,就是期待与渴望。换言之,未来向度存在于研究者的期待与渴望之中。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面向未来。这个参照系,仍是如前已述的那些以人为本、公民社会以及与自

然和谐等现代性原则。区别在于,做历史向度的打量时,研究者采用此参照系,目的是把它作为一种相对高的标准来对比的,而在做未来向度的打量时,研究者采用此参照系,却是把它作为马上就要变成的现实来要求的。

(作者简介:李珣平,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① 李珣平:《孟轲“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第12节,《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0期。